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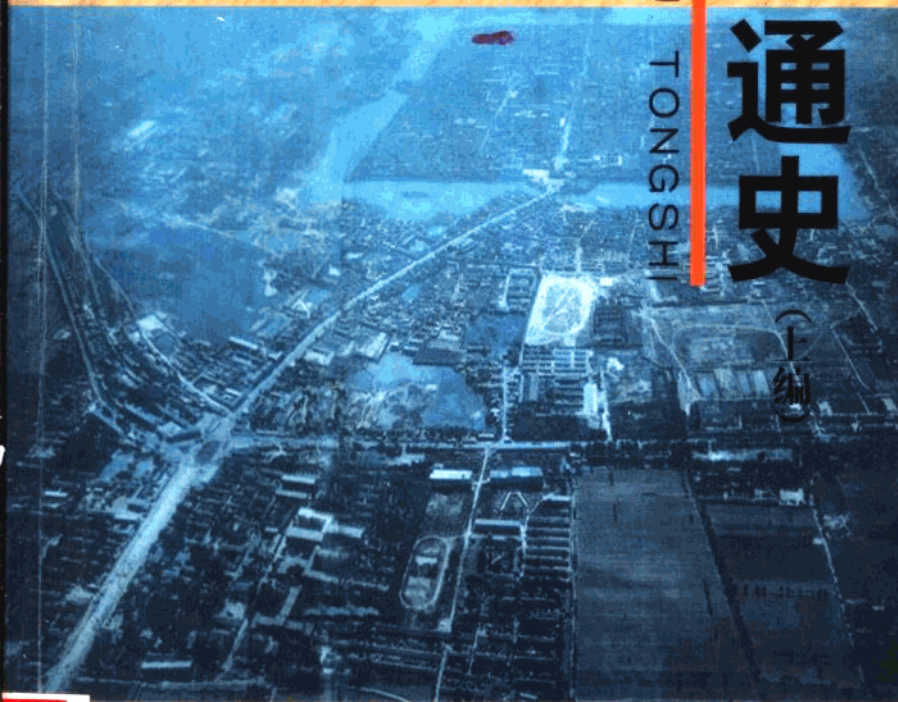
商丘通史

SHANGQIU TONGSHI

(上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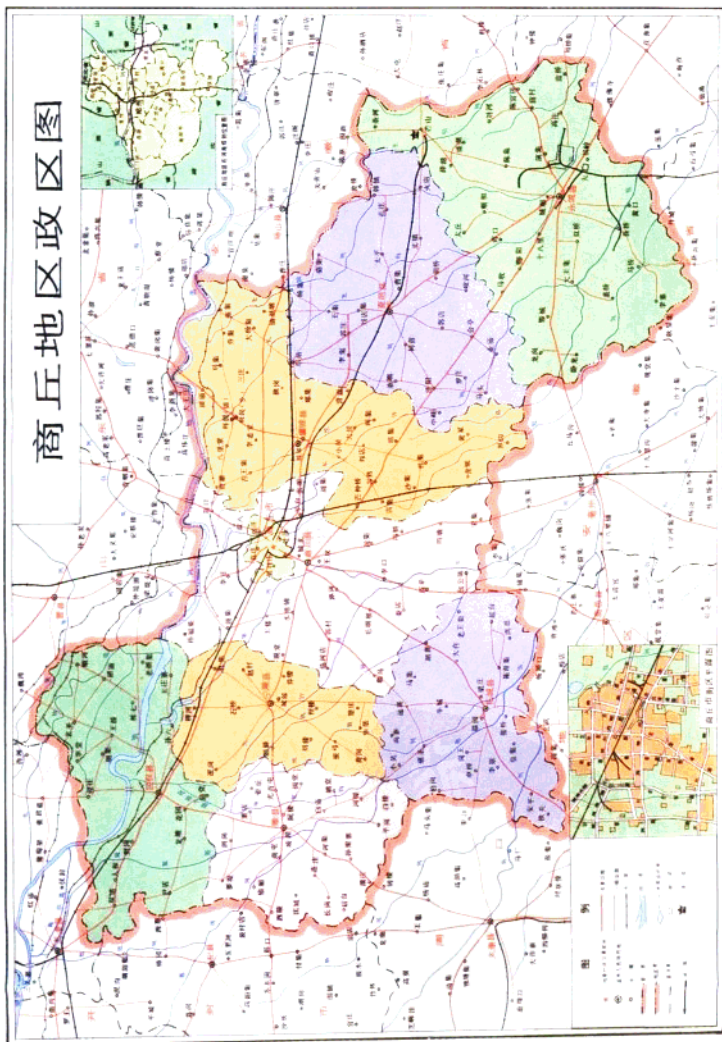
李可亭 等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商 丘 地 区 政 区 图 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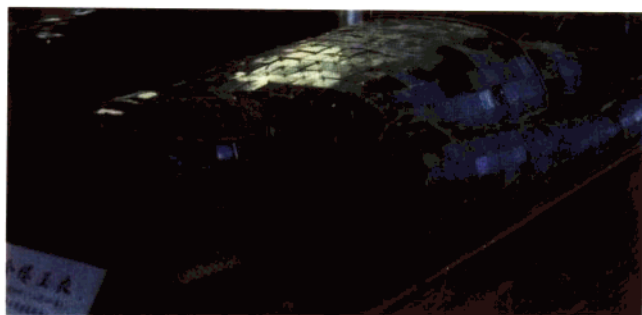
阙伯台



伊尹墓



梁国汉墓出土的画像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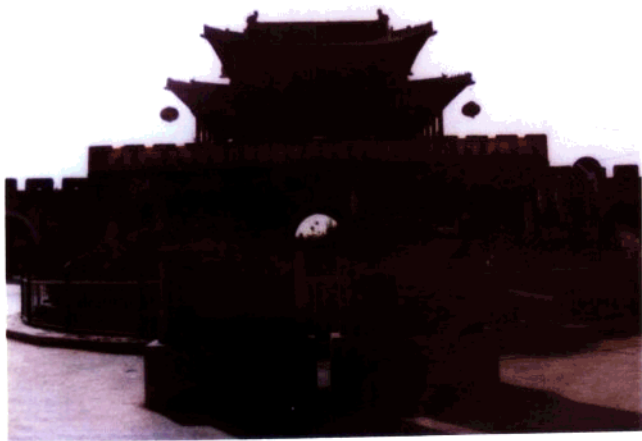
梁国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



颜真卿八关斋幢



归德古城鸟瞰



归德古城北门



壮梅堂



淮海战役陈官庄歼灭战
烈士纪念碑

序 言 一

商丘市是国务院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商丘的先民就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创造着古老的文明。商丘是商族的发祥地和根据地，商汤灭夏，就是从商丘出发的，从此开创了“三代文明”中的商代文明。西周时期，周武王封微子于宋，殷商遗民又回到了他们的老根据地，宋国遂成为中原地区具有先进文化的华夏族大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宋国已沦为二流国家，但宋襄公曾想一度称霸中原，加上两次弭兵会议都在宋都召开，仍显示出宋国有不可忽视的传统影响，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宋与齐、鲁两国都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儒、道、墨三大学派的活动中心。进入汉代，商丘又遇到一次发展机遇。汉初所封的几个梁国，都是当时实力最强的地方王国，特别是在梁孝王刘武时期，由于刘武受其母窦太后的殊宠及其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所建立的功勋，梁国的封地占据四十余城，且都是天下膏腴之地，刘武甚至享受到“天子的待遇”。梁国遂成为汉代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梁苑遗址、梁孝王墓及其他梁王墓，足以代表梁国当年的兴盛局面。刘武死后，梁国虽然被一分为五，但商丘地区的经济、文化优势犹存，直到东汉这种形势都没有改变。历经两汉四百多年的发展，在商丘及其周围地区，出现一大批历代为官、具有家学渊源、拥有广大田园及门生故吏、部曲佃客的豪强世族如济阳蔡氏、济阳江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等等。这些豪强世族，在三国战乱和西晋永嘉之乱后，举族南迁，成为东晋

南朝的高门甲族(一流门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南方开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隋唐时期,商丘虽然失去汉代梁国的鼎盛局面,但睢阳仍是中原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在盛唐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中,睢阳成为叛军不可逾越的鸿沟。睢阳保卫战的胜利,保卫了江淮地区不受叛军的蹂躏,张巡守睢阳壮烈悲歌,成为令人敬仰、流传千古的佳话。

在宋元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商丘已失去了汉唐时期的重要地位,但这一变化是逐渐形成的,而且是相对于南方而言的,至于在中原地区,商丘始终是豫东的重镇。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是商丘与北宋的密切关系。赵匡胤在建宋之前,曾任归德军节度使(驻商丘),可以说这是赵匡胤起家的根据地,而且宋的国号也与商丘有绝对关系,因为商丘古为宋国,赵匡胤起家于归德(商丘),故篡周后改国号为宋,并改归德为宋州。北宋历代皇帝都没有忘记商丘对宋朝建立的重要关系,所以宋真宗升宋州为应天府,意为“顺应天命”。以后又作为陪都改为南京,成为宋的“四京”之一。这些都说明商丘在北宋的特殊地位。毫无疑问,这种特殊地位对商丘的经济、文化发展都会起到推动作用。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就在商丘,说明商丘还是北宋的文化发展中心之一。但不幸的是,北宋结束也在商丘。南宋的第一代皇帝赵构,是在商丘即位后而南逃的。赵构南奔,就正式结束了北宋的历史。

元明清时代的商丘,政治、经济地位可谓江河日下,但豫东重镇的地位没有改变,并且成为另一种中心,即农民起义的活动中心。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清末的太平军和捻军,都在商丘有过轰轰烈烈的斗争,直到国民党的统治末期,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三大关键战役中的最后一次战役——淮海战役,负责总指挥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就设在商丘。这就说明商丘是在以另一种形式,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贡献。

以上是我在读过《商丘通史》书稿后，所产生的联想和体会。下面想再谈两点认识。

一、从某个角度讲，写一部地方通史，特别是写一部中小城市通史，比写一部中国通史还难。由于中国文物古籍浩如烟海，不用说写几十万字的中国通史，就是写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字的中国通史，在资料取舍方面也大有余地，而显得游刃有余，而写一部中小城市通史，主要问题是资料不足，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特别是中国的地方建制历朝变动不定，不仅资料难找，就是找到了资料，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都须再三斟酌，所以要把一个中小城市的历史资料搜集的点面俱全，而又不断线，诚属不易。还有一点，要写一部城市通史，必须摆正本市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位置，而且要摆正本市在历朝、历代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位置。我读过某市的一本史书，当它写到东汉时说：“除了洛阳可以与它并驾齐驱外”如何、如何。洛阳是东汉的首都，怎么会与一个中等城市并驾齐驱呢？这就是没有摆正自己的地位和位置。我认为《商丘通史》对于资料 and 位置的处理都很好，并能写出商丘历史的特色，这是难能可贵的，应予肯定。

二、写历史要有个科学态度，那就是言必有据，“信者传信，疑者传疑”，不能把文学故事、神话传说，当成信史。《商丘通史》的基本态度是科学、严肃的。如本书第十章写“木兰祠”时，就没有把木兰写成历史人物，而是根据范文澜先生的意见，认为《木兰诗》本是北朝的民歌，经文人加工后而成的精品，认为木兰“可能有一个女儿，曾代老父从过一次军”，于是就被民间歌颂为女英雄。木兰并非实指。并把木兰的姓氏、籍贯、时代、死因、终年的种种传说作了公允而不带偏见的介绍，这就比硬把木兰说成是某朝、某代、某地的人，真实可靠的多。当然，说写历史要有科学态度，并不排除对某些历史的见仁见智的不同认识。如本书把墨子写为宋人。其实墨子除有宋人一说外，还有鲁人一说，而鲁人说中又有山

东鲁国(东鲁)说和河南鲁山(西鲁)说。本书作者坚持墨子为宋人,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无可厚非,如果书中能捎带提一句,墨子籍贯尚有鲁人之说,对读者可能更有启发性。

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11月9日会见《中华文化通志》一部分编辑时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宝库,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宝库。”“为后代研究中华五千年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成果。”根据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来认识商丘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商丘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商丘人曾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它不仅是商丘人的大宝库,也是中华民族的巨大宝库。在商丘还出现过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哲学家、民族英雄、农民领袖及近现代的革命家。在《商丘通史》所附录的《商丘历代名人录》中,共收录历代名人315人(其中有个别反面人物)。在这三百多位历史名人中,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国家级名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曾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造自己的英雄,这个民族是可悲的,将要沉沦;如果创造了本民族的英雄,而不认识,不珍惜,这个民族也将沉沦。”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商丘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英雄群体中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以商丘的光辉历史和杰出的英雄人物,来教育商丘人民热爱商丘,振兴商丘。在这方面《商丘通史》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教育方式所不能替代的。尤其是自京九铁路建成后,商丘处于“黄金十字架”的地理位置,鹏程万里指日可待,商丘人民如能从自己的悠久历史中汲取营养,从历代英雄人物事迹中接受教育,将会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我想这也许正是《商丘通史》出版意义之所在吧!

无可讳言,《商丘通史》并非十全十美,其框架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其内容,特别是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内容,有待进一步充实。但是既然有了一个好的开端,我相信经过各位编者的继续努

力,再版的《商丘通史》,将会更上一层楼,其质量和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

李可亭同志曾就读于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专门从事商丘史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最近他和几位同仁共同编写的《商丘通史》即将出版,可亭同志向我索序,盛情难却,遂欣然命笔,写出几点感想,权充小序,并以此向几位作者表示贺忱。

朱绍侯

2000年7月19日于汴

序 言 二

绸缪已久的《商丘通史》终将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据我所知，在此之前，除本地各县、市编纂的志书之外，近年还出版了一些从不同角度阐扬商丘历史的书籍。其中有《商丘名胜》（阎根齐等编）、《商丘文史大观》（张龙之等编）和《宋州古今学人》（李广瑞主编）等。另有一部专写两周时期宋国的《宋国简史》（朱云松编著），已打印成帙，未及正式出版。这些书的内容比较简单，或只反映商丘历史的一个或某些方面，或仅写其中的一个阶段，所介绍的都不是商丘史的全貌。《商丘通史》则与此不同，它不仅对商丘数千年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代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叙述，而且从学术角度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分析研究，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既具学术价值，又具知识性的区域史专著。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就当前的条件来说，李可亭同志等能写出这样一部书，实在是困难。比方说资料，这里的藏书很少，查找点东西相当困难；再说时间，编写组的同志都有教学任务，有的同志还担任着学校的行政职务，编写之事就只能在行政工作或教学间隙中去做。在此情况下，最终能将编写工作较好地完成，实属难能可贵了。

粗览书稿，我对本书的编写工作，有如下几点感觉：

一、选用史料注意到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如写原始时代的商丘，引用了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遗址的发掘成果；在讲

述春秋时代宋国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时，参用了重要青铜器《宋公栾簠》铭文的内容。这不但使叙述更具说服力，而且提高了本书的可信度。

二、坚持了史料的可靠性。如关于花木兰的故事，本非信史，只因它在民间和戏曲中长期流传，甚至今天的一些新闻媒体也把它做为真人实事去传播，以致鱼目混珠，达到了积非胜是的地步。本书作者为了坚持史料的可靠性，把花木兰作为一种艺术形象，木兰祠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放在地方名胜中去介绍。这种态度是科学的。

三、能以史实的多寡为根据安排章节的内容。写一个地区的历史，资料上必受局限，因而不可能把每一个阶段的内容都能安排得那么均衡，因占有资料的多寡，必然有的章节内容比较丰富充实，有的则相形单薄。作者能从实际出发坚持客观态度，没有因要填补那些薄弱的章节，而穿凿附会，拼凑资料。

本书既是创例，自然不能要求它完美无缺，来日的修订势所必然。以下就此提两点建议，供作者斟酌。

一、应进一步鉴别资料，即使是“正史”中的说法，也要认真研究后，再决定去取。例如《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经清人梁玉绳的辨证，认为当时灭宋的只是齐国，魏、楚并未参与其事。（详《史记志疑》卷二十）这则资料如无其他合理的旁证，当以梁说为是。

二、要熟悉考古资料，因为只有熟悉它，才能准确无误地使用它。

我们编写地方史，就要对本地的考古成果有所了解。就目前来说，商丘地区发现的早期考古学文化，主要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等。其中以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或称“造律台类型”）的分布最广，文化内涵也最丰富，是四千多年前

居住在这里的先民们遗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资料。这些遗物遗迹可以证明那时的商丘及其周边广大地区,已经是一个人口相当密集,经济和文化生活比较进步的地带。它正处于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

在地层关系上,岳石文化迭压在河南龙山文化层之上,距今约三千多年,相当于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其文化族属,经考古学界论证,认为它是“受先商文化影响的东夷系统的文化”。《墨子·节葬下》说:“禹东教乎九夷。”这种文化可能与“九夷”有关。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也曾提出:“商氏族起自东方,与东夷集团关系颇密。”(见《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或者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一些商族起源地的线索。

商文化在商丘一带的分布也比较广,时间上可由早商延续到晚商,是我们考察那时商丘历史的重要凭借。柘城的孟庄遗址,是经过正式发掘的早商遗址之一。它的面积大,出土的遗物、遗迹丰富而且重要。《古本竹书纪年》说:“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囂(囂)。”该遗址可能是商都迁移后,留在故地的一个奴隶主居住点。

近年来,商丘地区西周至汉代的考古工作,主要成果集中在对宋国都城遗址的勘察和梁国王陵区的发掘、研究方面。据近日报载,中美联合考古队经过发掘和考察发现了西周至战国时代宋国都城的遗址,它的使用时间一直延续到西汉,外城周长 12700 米,城区面积约 10.2 平方公里,是迄今中原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都城之一。位于永城芒砀山的西汉梁国王陵区,也有许多重要的发现,这些都为进一步充实《商丘通史》的内容,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

王子德

2000 年 8 月于古宋之陲甌高

前 言

《商丘通史》(上)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我们几位作者奉献给广大商丘人民及学术界的一份圣洁的礼物,同时也了却了长期蕴藏在我们心中的一份心愿。衷心期望这本学术性著作在商丘历史的研究方面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商丘是河南省的东大门,位于苏、鲁、豫、皖交界处,陇海、京九两条铁路在此交汇,105、301国道纵横贯穿其间。历史上的商丘是兵家必争之地,而现在又成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商丘今天的版图和清朝归德府辖地相近。清末归德府辖一州八县,即睢州和考城县、商丘县、宁陵县、柘城县、鹿邑县、虞城县、夏邑县和永城县。睢州即今睢县;鹿邑县今属周口地区;考城在秦、西汉时名菑(zī)县,其前身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戴国,《中州杂俎》说:“戴,菑也,今拱之考城,有故戴城。”秦置菑县,西汉因之。东汉章帝巡行到此,因菑与灾(灾)通,其名不嘉,遂取发扬“列考武皇”业绩之意,改名为考城。考城方位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今河南省民权县东而稍北四十五里,离宋都六十余里,当即古戴(戴)国之地。”民国十七年(1928年),析睢县北七里、杞县北五社置民权县。1954年兰封、考城合并为兰考县。1956年7月又将原考城的顺河、老颜集、北关、褚庙等乡划归民权县。本书在论述中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基本上以今商丘市所辖一市(永城)、两区(梁园区、睢阳区)、六县(夏邑、虞城、柘城、宁陵、睢县、民权)为准,个别超出本范围的地方应为史实叙述的需要。

商丘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人类的活动。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永城市、睢阳区、梁园区、宁陵县等地发现了原始社会时期的文化遗址,即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商丘是传说时期的高辛氏的活动区域,是商朝前期和周朝宋国的都城。此后,西汉至西晋时期的梁国都于此。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因发迹于商丘,称顺应天命,所以到了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改宋州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又升为南京,与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天京大名合称四京,居于陪都地位。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1127年5月在此登基建立南宋。商丘古城是国务院命名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商丘”之名比西安、洛阳、安阳都早。

商丘文化灿烂,这里是北纬34.5度文明的东端和龙头,由此向西经开封、郑州、西安到宝鸡以至印度恒河流域文明、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克里克文化,形成了古代人类文明发生、发展的生存线。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墨中的道、墨两家发源于商丘,名家惠施以及融合道、墨的宋钐亦为商丘人,而儒家始祖孔丘的祖籍又在商丘,孔子本人也多次回乡讲学,影响至深。到了汉朝,经学博士商丘人戴德、戴圣对古代各种“礼”进行兼收并蓄,所著《大戴礼记》、《小戴礼记》成为儒家重要经典。可以看出,商丘是墨、道、名三个学派的发源地和儒家学派的重要来源和传播区,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生、发展的摇篮之一。

商丘人杰地灵,名人辈出。从墨子、庄子起,各朝代都出现了很多有影响的人物,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哲学有杨泉,文学家江淹、江总;唐朝时期直言面谏的宰相魏元忠,写下“斜光照疏雨,秋气生白虹”诗句的才子崔曙,史学家朱敬则等;宋朝教育家戚同文,医学家王怀隐,文学家石延年和宋庠、宋祁兄弟,书法家王洙,书目文献家王尧臣等;明清时期,商丘更是人才济济,据文献记载,当时登进士科者竟达四百余人,近三百人有著作传世。其中入阁为大学士者就有沈鲤、宋权、李天馥三人,三品以上列居九卿之位